



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第 1675 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内涵

□ 韩庆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道路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逻辑、本质特征、重要地位、世界意义的全面阐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实践、中国创造之世界意义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具有深刻政治内涵和丰富学理含量的新的重大论断。

首先需要理清三个基本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逻辑相关但也有区别的概念，首先需要理清，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一是“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共有的特征，即“走中国自己的路”，它是党百年奋斗并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历史结论，旨在破除中国道路问题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拿来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具体体现，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摸索出了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所选择的道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也要适合中国国情。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从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形式角度讲的，它既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而言，也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而言，是指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新时代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持和发展。

如果说“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对注重“中国国情”，那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且影响历史的历史场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更加突显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及其世界意义。

力求全面精准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刻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现代化”道路，具有“原体规定”，需要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可分两个层面:一是从现代化一般要素来讲，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注重工业化，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注重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内在注重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文化领域的自由平等和社会领域的公平正义。这是注重现代化各要素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的规律。二是从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来讲，在现代化“起飞”的初期阶段，首先必须注重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动力何谈起飞;在现代化进一步深入“稳定”发展阶段，在激活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必须相对注重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发展失衡是要“翻车”的;当经济社会发展动能不足、失衡失稳时，治理是关键，治理滞后，难以使动力和平衡达到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当代“中国式”的道路，具有“空间规定”。所谓当代“中国式”的道路，在政治上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经济上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文化上体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上体现为坚持公平正义，推动社会

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上体现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走出来的，具有“过程规定”，它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立足历史方位不断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开创中国道路而积累起来的首要“基本经验”，这就是中国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国情，也要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也具有“关系规定”，它既是在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相区别意义上说的，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而言的。它新在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新在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则致力于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强起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新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场景中，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关于这一点，易被人们忽视，一定意义上也确实被忽视了。

把“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中国式”、“基本经验”和“新”四者结合起来并取其精髓，可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及其“新”的丰富内涵:在人口规模巨大、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且符合中国国情;坚持不断与时俱进且具有开放性、创造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实现强起来;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有机统

一;坚持生命至上、美好生活、高品质生产、保护生态相统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内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高度凝练、纲举目张、简明扼要、秉要执本。

由此可得到两点启示: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而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注重运用市场和资本，但不被市场和资本所统治，它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创造和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互贯通、交互作用、合二为一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它注重的“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整体协调”“多元包容”等理念，便是如此。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础上创造和内生出来的。它超越了西方式现代性文明形态，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而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出来的，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中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光明前景、正确引领时代潮流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下转7版)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大有专论

如何正确理解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

□ 本报评论员 蒲 实



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这一宏观调控领域理论创新，既体现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也确定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基调 and 宏观政策基本态势，为“十四五”时期经济运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

什么是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旨在健全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的宏观调控框架或体系。“跨周期调节”的说法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时隔一年，再次重提与强调“跨周期调节”，是因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

续恢复增长，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但“不稳固、不均衡”仍然存在，因此要统筹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前瞻性、有效性。这就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加注重从中长期维度评估总体形势，提高精准性和预防性，避免经济运行相对于潜在产出出现较大波动，保持经济中长期在合理区间运行。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打破了宏观调控进行“短期”调节的传统，建立健全一整套由侧重相机抉择解决短期挑战向侧重解决中长期难题转变的全新宏观调控框架体系，将逐步完善和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现短期经济波动抑制与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兼顾，有效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如何把握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的关系?既彼此补充又各有侧重。逆周期调节是二战以后各国普遍采用的聚焦需求侧管理，着力解决短期困难的宏观调控方式，其优势表现在显著减轻经济波动幅度和熨平经济周期阶段过渡的短期负面影响;而跨周期调节在

逆周期调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中长期对逆周期调节短时效应的“跨越”，从而实现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形成了高度互补。从各自侧重点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不同:决策方式上，逆周期调节强调“相机抉择”，而跨周期调节则强调“未雨绸缪”。逆周期调节侧重于经济出现波动后的精准施策，跨周期调节着力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优化，更加注重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筹推进，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和内生动力。政策工具上，逆周期调节强调“单一实用”，跨周期调节则强调“多元联动”。逆周期调节一般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统调节方式，精准攻克短期扰动;而跨周期调节则强调财政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区域和产业等政策间的协调与配合，妥善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等中长期问题，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实施重点是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要根据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周期循环机制而动、实

时调控，强调规则调控和相机抉择的有机统一，综合施策、多管齐下。健全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作用，并聚焦关键指标为宏观政策调控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进一步加强中长期、跨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预研，处理好宏观调控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兼顾需要和可能做好平衡衔接，实现宏观调控政策的“长短结合”与“量质并重”。优化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机制，推动宏观政策手段运用保持统一协同，搞好跨周期调节和政策设计，进一步畅通传导机制，在充分发挥传统政策工具的短时高效作用基础上，融合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健全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强化宏观政策的市场预期，降低宏观政策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理顺政策的预期引导机制，通过加强公众沟通，着力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政策传导急转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构建破解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范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这里得以有效运行，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社会制度是民主建立与运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几乎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农奴的一切权利，并通过法律、宗教等手段对占超过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进行人身和精神控制。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向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前景。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叛乱后，中央果断决定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此，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享有了民主权利，成为了新社会的主人。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西藏各地方开始实行普选，翻身解放的农奴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享有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权利，选举产生基层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为西藏自治区的最终成立奠定了基础。1965年9月，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11%以上，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西藏自治区及其自治机关的成立，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主改革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西藏完全确立起来。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截至2019年，西藏全区依法进行了11次乡级、10次县级和8次设区的市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选举。西藏各族人民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藏各族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权利。

各层次民主制度有效运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以全过程实现。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只有将民主体现在制度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且具有实际意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从人民民主权利得以全过程实现的环节方面而言，大体的逻辑顺序如下:一是通过根植于基层社会的党的组织体系，建立人民群众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强化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实现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力量的协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 王彦智

调;三是通过人大、政协等制度性渠道，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进而实现从党的意志到国家意志的转化;四是坚持政策的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统一，确保各项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五是通过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等机制，确保政策的及时调整优化，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六是建立完善监督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七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依法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破坏。

协商民主在西藏地区呈现出独特的优势，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渠道。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发明。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协商民主始终贯穿于党经略西藏的始终。众所周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就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充分协商的结果。关于民主改革的事宜，中央再三强调，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改革开放后，中央先后召开了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均是经过上下充分酝酿协商。(下转7版)

本期导读

特别策划·依靠学习创造历史

邓小平的读书学习生涯

第 5 版

高端智库

怎样做好农村改厕这件民生“小事”

第 4 版

学哲学用哲学

思想以方法为本

第 2 版